

落叶随风

江西高校出版社

目 录

写在前面——并非多余的闲话	1
(一) 我的父亲母亲	3
(二) 苦乐童年	14
(三) 多事之秋	31
(四) 师恩深重	39
(五) 迷茫的“革命”	45
(六) 青干校·海司	57
(七) 华东革大·初恋	69
(八) 北京:东郊面粉厂	75
(九) 迷人的边陲	79
(十) 领略世态	89
(十一) 难忘的 1956	99
(十二) 走进生活的另一半	108
(十三) 人生急转弯	115
(十四) 艰涩的新路	135
(十五) 非常岁月	149
(十六) 一位善良坚毅的母亲	169
(十七) 云开日出	175
(十八) 生命延续	188
(十九) 迟到的甘甜	208
最后的话——真诚的感激	222
附录:永远的伤痛	226

写在前面——并非多余的闲话

自甲戌年(公元1934年)七月十七来到人世间,不知不觉已有七十多个年头,如今如同灯枯油尽,人生已到暮年,静夜独处,往事种种犹如昨日,便会潮涌般历历再现在心田脑海,让人感慨,让人唏嘘。此生苦短,又逢多事之秋:民族苦难、战争离乱、革命洗礼等等等等,再是接踵而来、不由人自主的意外以及永无休止的“触及灵魂”或叫“脱胎换骨”的种种运动……直至今日。岁月蹉跎却仍然未能明白几十年光阴浑浑噩噩是怎样过来的。但,倒是悟出了唐朝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诗家三昧,或许也还是自以为而已,其实还是没能真正地读懂。

言归正传。

话说《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衔着镌刻有“莫失莫忘,仙寿永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通灵宝玉从娘胎里出生的;岳飞、岳鹏举则是岳老太夫人在梦见灵鹏神雕率天上众鸟雀护宅卫邸而来到世上的,他们都有天上神灵护佑,因而生来就天赋异禀,长大后又都与常人迥异,不同凡响,或聪慧过人,或为国家柱石栋梁,非普通人可比而及之。而我出生时节既无灵玉可衔,亦无天降祥瑞,有的只是那无法抗拒的非无产阶级出身者与生俱来的“原罪”,伴同着来到这纷繁喧嚣的世界上,所以注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必将与各种磨难相依相伴,且如影随形般摆脱不了。这自然怪不得别人,怨也只能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

不是赤贫如洗的贫雇农或两手空空却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不过仔细想来,从我晓得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祖国拥有四万万同胞的时候开始,就还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三人也都和我的父辈一样,成天碌碌为养家糊口与生计而辛勤奔波着,只以能谋得一官半职,有足够的薪俸可以保全家人衣食无忧而不必去鼠窃狗盗,甚至丧尽天良去为非作歹即感满足,亦就不必为



他们的“落后”、“冥顽”引以为憾了。当然,世上比父母进步的“先知先觉”还是有的,不是吗?早在二十世纪初,当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刚刚给东方带来一丝曙光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有了中国自己的共产党组织。不过,那时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据说中国共产党 1921 年在上海(中途移师至嘉兴南湖船上)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12 名正式代表可怜兮兮地仅仅代表了全国总共 57 名党员。与 4 亿人口相较,其比例大概要算到小数点后边第 8 位去了。能埋怨父母的就是谁让他们都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未能放眼世界,洞若观火地远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伟大的革命真谛。否则早早地抛弃掉养儿育女的责任,也跟着蹭上井冈山去挑挑米,或者在大雪山脚下候着,赶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末班车,让我们这些做小辈的也能沾光混上个烈属或红军遗孤什么的当当,那就不但可以脱却“原罪”桎梏,说不定还极有可能有朝一日也借以捞个一官半职,飞黄腾达一番,那该有多好!幸而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个“法不责众”的说法,现代人的心理也有从众、随大流的惯性,就像物资紧缺那年代,看见铺子门前排着队,用不着先问在卖什么,自己需要不需要,赶紧抢先一步站到最后占个位子再说,即使捡不到便宜,总不至于会损失什么。所以,既然绝对绝对的多数都如此这般地活着(拥有几百万、几千万共产党员这么庞大的队伍至少也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了),我们做后辈的也没有理由去苛责他们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生米既成熟饭,怨也晚矣,倒不如忍之、安之、泰然处之。现在之所以还要把如此一个走在路上,陌生人决计不会在人丛中将之认出是张三、李四某某人的一个小小老百姓这辈子平凡、庸碌、痛苦、欢乐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我没有作家们的八斗高才,也没有明星们能掀起轰动效应的作“秀”本领,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值得炫耀,也不欲给晦暗的人生涂脂抹粉,唯一的用意只是想在跨入耄耋之年,生命已进入人生倒计时之际,把个人的苦难、失落与幸福告诉后人,让他们能够从中领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世态和父母辈历经的风霜雨雪。其中,或许有什么教训、体会也庶几可免再重蹈覆辙,从而努力驾驭好生活,把握住命运的恩赐,认认真真地学会如何做人,去开创自己事业的美好天地。仅此而已!

在记录人生轨迹的时候,我也不愿做筛选生活颗粒时那种只留下好的、美的、真的而漏掉坏的、丑的、假的那样的“筛子”。只希冀能保留一份珍贵的“真实”!

絮絮叨叨,设若事实如有乖违,言语与时代有悖,文责自负,所有一切,概由本人一体担承。口说无凭,立此存照!

(一) 我的父亲母亲

人的大脑要是能如同计算机那样具有储存功能,或者眼睛可以和摄像机那样从出生开始即将生活中经历的点点滴滴全部摄录储存下来,需要时凭检索、调集即能随心所欲地重置、复原,那该有多好。可惜,眼下却办不到。现在,大多数人对自已儿时和童年的事情或场景有些支离破碎、零星杂乱的印象,其信息来源大抵是从祖、父辈老一代人茶余饭后的闲谈或追今抚昔的感慨中捕捉获取的。

毫不例外,我对自己父辈们的家庭情况在印象中也全是一片空白,何况还不像其他人那样有众多叔伯姨婶的枝枝蔓蔓,可以询问查证,更特殊的原因是由于父亲在我仅仅只有十一岁的时候,就抛下我们辞世早逝。回到母亲身边后,未及中学毕业,又一直寄宿在学校住读,仅仅只有在短暂的假期才生活在一起;旋即又投身“革命”,漂泊四方,直到她老人家鹤驾西去,再也未能侍候身畔,随时聆听教诲。所以对于家的概念,似乎从来就是那样的淡漠,盲点处处皆是。如今,欲询无门,往昔种种俱已成谜。痛心之余,唯有徒唤奈何而已!

下面记述的一鳞半爪,皆为母亲生前兴之所至娓娓道来,其中爱恨怨叹,个人情感所系,难免谬误进退,又无从印证,只有如实照录,不敢妄有丝毫增删或更易。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 ※ ※

我父母亲同姓同籍,皆为江苏武进人氏,在当地,庄氏一族为大姓人家。我曾经纳闷过,问母亲“《左传》中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记载,《晋语》中也有‘同姓不婚’之说。按照中华传统习俗不是同姓之人不婚吗?”母亲说,那是指五服之内所说。她和父亲之间,已辨识不清是十几服,还是几十服之外的瓜葛了。我算是似懂非懂地恍然大悟了。父亲讳智雄,生得眉清目秀、慈祥 and 和善,身材也高大魁梧,家道颇为殷实。据说庄氏祖先

本为严姓,曾在前朝为宦,因事获罪于上,亲属为避牵连殃及,举族逃离故乡,其中迁来江南的一支,改姓为“庄”。从此,该地方有了庄氏一族。父亲在原籍由父母之命娶有妻子,并育有一男,取名辛元。夫妻间因为缺乏感情及共同语言,父亲之后离家到上海谋求发展。弃家之前,父亲为母亲的艳容所倾倒,虽然其时母亲才年方16岁,却出落得楚楚动人,犹如枝头绽放的花朵了。母亲说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支手枪,找到她求婚,若不答应就当她面饮弹自尽。被吓着了的小姑娘(还有后面将要说到的原因)就这样被“迫”嫁给了父亲,之后一起到了上海。父亲靠朋友的帮助,一边在一所私人银行谋得襄理一职,另外自己还和别人合伙从事小额的皮货生意,生活也还算过得去。由于父亲性格豪爽,所以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这对他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帮助作用。之后,父亲又偕同母亲到杭州苏浙皖税务总局任会计主任一职。不久,母亲因不习惯杭州缺亲少友的清寂生活,只身回到了上海,父亲则频频往返于沪杭之间。父亲在一次旅途中遭遇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袭击,不幸右腿被炸伤,在上海医院抢救中截去了小腿而安装了假肢,此时全靠母亲一个人在身边照料。此后,父亲行走起来便一定要借助“司的克”,不甚方便了。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位慈祥和蔼且乐善好施的人。除掉朋友宴请外,不嗜烟酒。私塾出身未进过洋学堂的他闲时在家唯一乐趣便是挥毫泼墨,父亲写得一笔灵逸清秀的柳体大楷,我开始学写毛笔字就得益于他的启蒙与指导。父亲虽然没酒癖,但我印象极深的是每年冬季他都会兴致勃勃地指挥仆役做杨梅汤的情景:每年严冬大雪过后,他让佣人取洁净的雪花装进青花瓷坛里,直到融化了的雪水装满坛子为止,然后用油布盖住并在上面以厚厚的棉垫压着,外面还得用油布绑结实了封死口,然后埋入园子里的泥土下面。待到杨梅上市季节,将红得发紫、让人见了馋涎欲滴的新鲜杨梅浸泡在坛子里。据说喝了这样琥珀色晶莹般红的杨梅水,可以败火爽神,暑天还能去痱疖呢。



舐犊情深,父亲对我和小春姐的溺爱是少有的。记忆中好像从来就没有挨过他的打骂,如果有什么让他生气的事情,最严厉的大概就是罚我们写字或背书了;我们若有所求,只要说了,几乎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如果是讨钱,衣服挂在衣架上,通常是让我们自己去掏皮夹拿的。姐姐因得伤寒去上海母亲身边后,我便成了他爱有独钟的宝贝疙瘩。父亲不仅大包小包地给我买喜欢看的书,还常

买糕点糖果给我吃。父亲的床下有一只木盒,里边装了沉甸甸的满满一盒东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傍晚的西子湖畔像庙会似的,要把戏的、挑担卖零食的、油炸、臭豆腐、炒白果、梨膏糖、蚕蛹等等应有尽有热闹得很,其中一种卖大碗红枣汤的,几颗白莲加上十来粒大枣只收两个铜板。原先,我并不知道父亲床下的木盒里装的什么,有一次,我向父亲要两个铜板,因为都已经是用纸币了,父亲以为我要铜板是做什么玩儿,便指指床下对我说:盒子里有。我打开一看,竟然满满一盒全是光绪年间铸造的铜板(中间无方孔的那种)。从此,放学后我去湖边听说话或去看“大变活人”,就会到木盒里拿几个铜板,直到用掉了一小半,才被父亲发现。他问我拿铜板去做什么,我嗫嗫嚅嚅地说买东西吃了。父亲生气地说:为什么不问我要钱,却去拿铜板?我说:人家要铜板嘛。父亲只讲了一句“以后不许再拿了。”事情也就这样算了结完啦。

母亲庄静雯本应是个极其能干的女强人,她自己也不止一次颇为抱憾地说过“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在没有读到书。”言下之意,她如果有了文化,就不是如今这样的家庭妇女了。只要是说到读书,又会勾起她满腹的辛酸。外祖父家共有六个孩子,母亲是最小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女孩,所以从小就是外祖父母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有了好吃的,两位老人自己舍不得吃,哥哥们没份吃,只有她独个儿有享受;过年了,别人没有新衣服,她却是必不可少的;哥哥们要帮家里干各种活计,她却只知道成天和小朋友玩耍。所以五个哥哥都十分妒忌这个小妹妹,可是又没有谁敢欺侮她,如果谁敢碰她一指头,便会被两位老人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拿起手中烟杆随手敲过来。只可惜,这样被娇宠的日子过得并不久,在母亲还不到6岁的时候,外祖父与外祖母便相继抛下她去世了。从此,小妹在掌家大哥大嫂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就难过了,别说好吃好穿的特殊待遇没有了,大嫂还要像支使丫环那样差遣这么小的人儿去做些从来就不曾做过的事情,稍不称心还会讲些“白吃饭”、“嫌累赘”等让人听了难受的闲话;到了应该启蒙上私学的年龄,前面三个哥哥的孩子都已有母亲一般大了,不分男女一个个都进了私学去念书,唯独这个小妹妹没有谁想起她也应该发蒙了。母亲伤心欲绝地央求兄长,得到的竟是不屑一顾的白眼与嘲讽“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什么书!”没有一个哥哥甘愿慷慨解囊拿出这一点钱照顾自己的小妹妹。冰火两重天,母亲就在成为孤儿后,见天生活在哀伤与屈辱中,而且还不敢在人前有半点流露,伤心时只能一个人偷偷躲在僻静的角落里悄悄抹眼泪,怀念猝然过早撒手人寰疼爱自己的双亲,哀伤兄长们寡情少义不念惜手足之情。

正是在这凄凉的环境中,仅仅为了能摆脱这般寄人篱下,一个感受不到温暖,只能勾起痛苦回忆与冷若冰霜的“家”的生活,她才强忍悲痛,刚达及笄之

年,便毅然答应了大过她十多岁的父亲,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就没有回过生她养她的故土家乡,只有在极其难得的机遇才会“深恶痛绝”地说起自己的身世与那几个不知生死的亲人!一个本应该是极其温馨的家,一个可遮雨挡风的港湾,留给她的却是太多的辛酸与伤痛!能够记忆的也是无尽的不堪回首的种种!

按照有一次她老人家对我的说法,除掉现在已从香港回上海定居的小春姐之外,我本应该还有个二姐,算起来她比小春姐小两岁,比我则大两岁,小名叫小秋。原委是这样的:父亲在杭州工作时,隔壁邻居住了位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军部下的下野师长,这位师长虽然除了原配妻子之外,还纳了两个小妾,遗憾的是三位太太居然全都一无所出,不曾生养得一男半女,这成了师长在人前直不起腰杆来的心头大痛。平素间因为是邻居,偶尔也有所来往,小秋姐“呀呀”学语时,长得乖巧玲珑,活泼可爱,忒惹人喜爱,那位师长见了更觉得自己的失落与寂寞,所以经常来我家拜访,名为与父亲攀谈,实为与小秋逗乐。日子一长,有一天那位师长终于拎了一大堆礼物上门来了,在父母惊诧的眼神下,他道出真正的来意:想过继小秋为干女儿,将来小秋姐的生活、学习直到出阁所需,一概由他承担。看他那恳切的神态,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事情来得意外,父母毫无心理准备,当下便客气地以容再商量推托了,不料这位邻居竟接连两天涎着脸上门来乞求。父母亲几经思量,想到他家没孩子,小秋过去后未必会比自己家差,况且又是邻居近在咫尺,便答应了。后来那位师长居然择了吉日大宴宾客,正式隆重地行了过继大礼,削木成舟,我们就此多出了一门干亲。小秋过去后,师长一家确实待她如同己出,呵护有加。尚不懂事的小秋则在两家跳进跳出,开心得很。再后来,他们一家回了北边老家,从此就断了小秋姐的音讯。除了空留多少牵挂,骨肉之间再无丝毫系连。说到这里,母亲便声音哽咽,眼圈红红的不胜伤感。

杭州,这古朴秀丽的人间天堂,其山水风光之旖旎自是独步天下,然而其繁华、现代岂能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较。母亲回上海后,最早,他们在辣斐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新康花园的房子还在。新康花园是条幽静整洁的小巷,巷里一式20多幢带花园的两层小别墅,南北两头分别与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相连通,属沪上较好的住宅区。由于靠霞飞路一端的巷内有一个“U”形小弯道,它就成了上海滩上唯一一条巷内设有红绿交通指示灯的巷道。在辣斐德路一端,仅只一墙之隔,便是威镇足坛的东华足球队的训练场,寒暑假时,我常常到里边去看球员们练球。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我和小春姐还是比较开明的。她老人家从不强制要

我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背离道德与常例,她也不会加以干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祖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给她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滋润,加上自己幼年求知不得对文化的渴望而从生活各个方面刻意努力地汲取,使她“自育”了温良恭俭让的品行,尽管她认不得多少字,但却能非常熟悉地讲述《烈女传》、《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和“三从四德”这些今天看来是束缚妇女自由的封建伦理道德。这大概与她老人家平素特别喜欢听弹词,评书不无关系。

母亲对我们平日待人接物的言行举止管束得极其严格,偶尔有点不合时宜或体例的举动,不论在人前人后,她都会毫不留情地“当面开销”。当然,在这方面她自己更是我们的表率。相对比她接受过更多教育却对许多生活习俗礼仪比较陌生的我们,老人家常会发出恨铁不成钢的叹息,并凝缩成一句经常会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有些事根本用不着教,眼睛看看也应该学会了。”有时她还说得更为简单:“凡事都要合乎身份!”我明白她的心思,在繁华富庶各色人等杂处的上海,所要讲究的“身份”,无非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交际场合中的行为规范罢了。不过我们也理解,新康花园所居住的人家都是些有产人物,如若行为不加检点、不得体,在那个社会里,就会显得低俗、粗鲁而遭人“白眼”。然而,回过头来说,即使有许多东西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货色,倒也和素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之称的我国传统文明习俗并无相悖之处的。不是吗,什么孝悌仁爱,敬老爱幼,包括孔孟之道,朱子家训等等一切,莫不都体现了一个“礼”,一个“仁”?曾经有过一次,世交丁伯请我们在“大三元”吃饭,饭后,丁伯热情地问我:

“今天的小菜还合口味吗?”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了句“还好!”

“你会说话吗?”话音刚落,旁边的母亲便一脸冷峻地甩过几个字来。

我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一张脸瞬间憋得通红通红,急忙向丁伯赔不是。

“丁伯,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很好呢,请别介意。”可是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母亲也还不依不饶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教训我:

“有你这样说话的?如果丁伯不是一家人似的,换了别人不把做父母的骂死才怪——怎么调教出这样一个没教养的东西!”

我只能低着头红着脸唯唯诺诺地听她老人家数落,因为这不经意间随口而出的两个字,确确实实既会大大地扫了丁伯的兴,也会重重地伤了母亲的脸面。好在我们两家是几十年的世交,丁伯也不至于会和我一个孩子较真,但我却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时时刻刻都要慎于言行!

就在母亲这样一点一滴大事小节的耳提面命下,我们日积月累地懂得了“有教养”的人应该是怎样做的:与长者在一起,就起身垂手侍立、不招呼不落座,长者说话时不插嘴,对话不得直视长者眼睛,落离座时超前为之移座,非引路不得走在长者前面;至于个人形象方面必须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站不分脚,坐不歪身,不架二郎腿,不可抖动腿脚,绝对不能光脚趿鞋和穿着睡衣出门。中国人饮食文化之“精深博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在“吃”的学问上,禁忌也顶多:什么食不露齿,咬嚼、喝汤不得发出声响;夹菜时不可夹了又放、放了再夹,不得在菜碗里拨来拨去地挑拣,桌面太大时筷子切莫过中线,过则不雅;新上的菜不动第一筷,不夹碗盘中最后一筷菜等等。这许许多多的清规戒律絮絮叨叨总结在一起,大可汇编成厚厚一册《人生生活必读》。说来也怪,这数不胜数的条条框框,根本无须死记硬背,只要有点“心”,就能在平常日子里下意识地应付裕如了。

你还别说,这些日常生活里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小节”,真正留意做到了,也还真让我们博得了不少亲朋好友的称赞,最多的是夸奖我们“斯文”。听到这样的赞语时,我们心里就会很高兴,母亲脸上也会洋溢出笑意。

兹事体小,印象却深,而且让我受用一生。这不是在崇尚资产阶级的“风度”,应该是做人处世起码的“礼”。不能说,无产阶级就应该是放浪形骸、不拘小节的粗鲁者吧。就是在古代,有文化的人若做出了不体面的举止,便会有人轻则说“有辱斯文”,重则即直斥为“斯文扫地”。可见“斯文”两字从古至今都是做人起码的品质,否则便是无赖、泼皮了。

母亲这一生另外还有一件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就是房子事件。她老人家不止一次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起新康花园两次搬迁的事情。第一次是在日本鬼子占领上海后,要征用此地作为日本驻屯军头目的住宅,强迫所有住户限期迁出。那时,这是无法抗拒的命令,母亲只得迁居到靠近跑马厅(现在成了人民广场)附近泰兴路口的泰兴公寓居住;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又重新搬回到原处。第二次搬迁则是1949年上海已经解放时的事:有一天,有“公家”的人上门来“协商”,新康花园将全部被华东军政委员会征用。不过,这次来人比较“客气”,原住户可以在上海任意地点挑选所有敌产和公有空房中感到满意的房产,并由政府统一安排搬迁事务。来人态度虽然十分平和从容,其实大家心里都透亮着。既然政府已然相中了(何况还是华东地区最高行政机关),这名为“协商”的来访,同样也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而已,由不得你允诺与否,“识相”点好。经过多方寻访,母亲选中了位于福开森路(现在的武康路,在淮海西路西端)六层西式建筑的诺曼第公寓四楼的一套房子,有电梯,一层为临街店面,其余五

层俱是住宅。此地距徐家汇很近,与衡山路相邻,环境幽雅气派,隔壁是曾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与《聂耳》等等众多经典影片的海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郑君里家,一段时间,著名影星周璇就住在他家里。最难得的是从宽敞明亮的临街长窗望出去,马路对面即是国母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私邸花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孙夫人素衣便服与仆役在园中散步;偶尔,福利会少年儿童来园中表演,更是历历在望,一览无遗。

1950年初,母亲与一沈姓医师组成了新家庭。我从华东海司去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临离开上海前回去看望了她老人家和姐姐,这是我离家出走参军后将近两年来第一次回家,即便华东海军司令部当时就在上海水电路,为“划清界限”,我都一次也未曾回去过,只是把军属证寄了回去。这大概极大地刺伤了母亲的心。但见到我之



“文革”中母亲来昌探望时

后,她仍然十分激动。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邀了小杨(金明)同行。一进家门,看到我们军服裤脚全湿透了,母亲立即让我们脱下来,叫阿宝阿姨拿去烫干。不过十来分钟,阿宝就将烫得笔挺的裤子拿了出来,我赶紧让她进去把所有的线条重新烫平来,部队里不兴这个,穿出去影响不好。我把别后情况和即将去苏州革命大学学习的事大概地给母亲说了,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眼圈有点红红地嘱咐我:在外边自己要当心身体,有空就多写点信来。随即我们便告辞出来回到了军营。

三年自然灾害,物资特别匮乏的时期,母亲还不时从干爹那儿要来用外汇“奖励”得来的粮票、布票、罐头和猪油以及进口食品等寄给我们。1958年,我再次去上海,母亲还设法给我买了一辆当时属于“俏中之俏”的永久牌自行车,这辆车我回南昌一直骑了十多年才报废。

“文革”期间,母亲也难逃厄运,家被抄了,还从诺曼第公寓宽敞的住宅里被赶了出来,搬到了重庆南路一条小巷里的亭子间居住。尽管这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已沦落到十分艰苦的地步,但听到我几次被投入“灰牢”,老人家依旧放心不下,花甲之年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彼时母子、婆媳、祖孙在此种俱皆身罹磨难之中的境况下相见,除了强颜欢笑、互相宽慰之外,再没有多余的话好说了。

“文革”结束,抄家时被抄走的银行保险箱中的金银首饰有了着落,政府将

按当时出具的有效收据退回“失主”。真得要谢主隆恩！也算是天大的侥幸，凭着意外保留下来的一片纸条，最后一些物件退是退了，不过不再是原物而是变成了“按牌价折算”退还现金了。虽说两者的价值根本无法衡比，但较之更多人在“造反有理”的一次次劫掠中，财产或被抢，或被烧，或被毁却，什么凭条也不曾留下，无影无踪石沉大海，总要幸运得多，这已经是格外开恩让人喜出望外，不啻是天上掉下馅饼来。我们的百姓就是这样的善良，你抢走了他的饭碗，回过头来再还给他一小口饭团，他就不会怨恨你，反而还要感恩戴德地感激你的大慈大悲，这大概就是传统的中国弱势民众的心理逻辑。这时住房条件也稍微好了些，亭子间换成了北京西路铜陵路口一幢公寓楼里二楼的大间，这原本是一户人家的独居楼层，此刻成了三户人家的公房。房间倒是大了，只是厨房与卫生间成了公用的，洗澡、“方便”都要凑空档避“高峰”，否则便要排队“伺候”啦！



“文革”时在南昌八一广场主席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悦儿、伟儿考上大学后，先后去上海探望过祖母（伟儿去合肥工业大学是必须经由上海转车的），看到自强自立颇为有出息的孙辈小孩，早已年过花甲的老人家特别高兴，每次都会亲自下厨做拿手好菜犒劳他们。

1978年，姐姐、姐夫先期去香港定居。1981年，母亲也获准去香港定居了，直到一切手续已全部办好，但“往来港澳通行证”（单程）却迟迟拿不到手，老人家到公

安分局问过几次，终也不得要领，姐姐来信要我去上海落实此事，解决后顺便送老人家启程并料理家里的杂物。于是我与茹玉一起来到上海，我赶到静安分局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经办人，这才拨开迷雾，撩开面纱弄清楚了通行证迟迟不得下来的蹊跷。料想不到，问题竟是出在护法、执法的个别公安民警身上。

原来，北京西路的房子，母亲和姐姐都想保留着，假若她们要回内地来，或者我们去上海，都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没想到，这不大的一间房子竟然被当时静安分局的民警杨某人看上了，我与她会晤时她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要以通行证作为交换条件，一手交过了户的住房证，一手发放往来港澳（单程）通行证！几经长途电话与姐姐磋商，胳膊拧不过大腿，除非放弃赴港的念头。从顾全“大局”计，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同意了杨同志的条件。为免生枝节，杨同志提出由她来办理过户手续。这没有什么说的，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说是权力在手抑或官官相护，仅仅过户小事，哪有办不成之理！两天后，杨同志打来

电话,称过户手续已经办妥。像电影和小说中“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似的约好在铜陵路某巷口会面交换证件,这才算拿到了母亲去香港的“路条”。杨同志将证件交给我时说得极其热诚,差点让我感动得掉下泪来,她如是说“你们以后如果要来上海,先告诉我,还可以到这儿来住,我还可以弄车子去接你们。我们算是朋友了!”多么动听的承诺,她竟然将我当成了不懂一点点事的孩子了。

将母亲送上去广州的列车,我和茹玉回到狼藉的住所,按老人家和姐夫他们的交代,将所有的家具杂物处理完毕,带着留给我的松下 21 寸彩色电视机回到南昌。我从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的赤贫户,一夜之间成为单位宿舍里第一个拥有了彩电的“阔人”。但从此,我在内地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1985 年初,我去香港探亲,她老人家身体依然十分硬朗,闲暇时便陪同我去看望冯阿姨,恰巧冯阿姨的女儿玉华姐也从美国归来探望,忆及 1945 年我初到上海时,在圣母院路圣达里(今瑞金二路)她家暂住,和他家小弟一起吃、住、玩,玉华姐还教我学唱过京剧《甘露寺》与流行歌曲“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的情景,大家无不感慨万千,当时十多岁的娃娃如今俱已是为人父为人母到了不惑之年的人了,两位老人又岂能不两鬓飞雪、步履蹒跚呢!几十年的交谊,阔别几近半个世纪,相见便格外亲切,大家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母亲还带我去看望了另一位老朋友黄红真。黄家在新界,乘车、转车老人家都很清楚。平时下午,我们也会一道散步去铜锣湾,去海边,或者要一杯咖啡、一碟点心,坐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抚今追昔,回忆从前的种种人事趣谈……探亲假期届满前,欣逢母亲生日,姐姐请了几位老朋友(大多是从内地移居去香港的)在家聚会为母亲祝寿,大约是上了年岁经不得热闹的缘故,尤其是朱姨带来的两个小孙子,在房间打打闹闹,在沙发上跳上跳下,当晚十点多钟客人散尽后,帮着收拾房间的母亲突然头晕倒在沙发上,我急忙给急救中心去电话,港府玛丽医院立即来了急救车,还有警察陪同,查看身份证并验明非暴力治安事件后,无需家属动手,上担架,进电梯,送入救护车抵达山顶医院办妥住院手续,进行急诊救治,半个多小时全搞定 OK。住院期间,除掉每天缴纳十来元港币膳食费外,所有检查、药物、床铺等费用,悉数由政府全程买单;而且医院内外,环境幽美清静,设备完善,服务热情,出院时除配足一周的药品外,还发给一张预约卡,指定日期再来复查、取药。这等福利服务,真可谓尽善尽美了,相比国内的看病难、药价高和医药领域中的种种黑幕猫腻,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母亲住院期间,每天下午我都到医院去陪伴她。一个多星期后,老人家痊愈出院,我才放心地结束探亲之旅,经罗湖桥踏上返赣的列车回到自己的家!

1986 年,茹玉去香港探亲,回来时母亲与她同行来南昌,在这里过了年才返

回香港，一家十几口人热热闹闹地陪她玩方城游戏，一上去儿孙们的家中吃饭，傍晚我们陪同她到河边绿化带内散步，生活虽然简单，却也其乐融融。同事和邻居们见了，无不称羡老人家生活得美满幸福，说她“好福气”！与“文革”时期她老人家忧心忡忡地来南昌短短几天逗留时的生活相较，母亲感受到了我们一大家子如今的生活已是今非昔比，虽不是宽绰有余，但却是安定无虑。她老人家心里倍感欣慰，两个多月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香港。

1989年，我第二次去香港探望母亲，这次她老人家身体倒是硬朗依旧，只是记忆力已有所减退，一些往事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记起当事人和具体细节。这期间，悦儿与静儿也先后去香港看望过她。

1990年元月，母亲再次乘直航班机来南昌，已经76岁的老人腰板还是那样挺直，行走起来也丝毫不亚于常人，只是记忆功能已远非往昔可比，开始有了健忘、失忆征兆。从机场回家的车上，她连着三次问我有几个孩子。回到家后，再和她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她已根本记不起来了，再后来，哪怕是刚才发生的事，转过身来便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说她是到香港去才落下的病根。在上海，她虽然孤身一人，但老姐妹、朋友多，生活比较有规律，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轻松，她们每周都有安排好了的固定的“节目”，一二三四五六日，不是雀战，便是在一起品茗闲聊，谈天说地，最后大家尽欢而散。到香港后，她时常独自一人守家，老朋友们咫尺天涯，除掉电话叙旧外，寂寞孤独，使得性格自然慢慢封闭孤僻起来，特别是得知比她还小两岁的朱阿姨过世后的伤感悲痛或许还有对自身年迈的顾虑使然，老人家明显地消瘦了。我和茹玉只有每天以好菜好饭侍候着她，其他也无能为力了。这次母亲住的时间比较长，整整让我们尽心孝敬了十个月。茹玉就是在送她去深圳交给来接她的外孙胖胖这一次中，在深圳一个雨天去赴宴时，走过食厅大堂里滑倒而摔断了右腿骨的，由此才在蓉儿家足足治疗、休养恢复了一个月，连带将大儿媳小芬与小阿姨九庆也送到深圳去照料。

1995年4月，传来母亲突然逝世的噩耗，我已来不及办理出境手续而未能亲自送她老人家西行，只能由姐姐代我向老人家磕头致哀了。母亲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母亲享年81岁，儿孙们都遥向西方拜祭祈祷，安息吧！

※

※

※

此外，我唯一的姐姐，她自幼身体孱弱，多灾多病，从在杭州患伤寒回到母亲身边后，读完小学进启明女子中学读书，启明女中与我以后就读的徐汇中学仅一浜之隔（肇家浜是一条排废水的小沟，犹如老北京的龙须沟。解放后已经填埋改造成宽阔繁华的肇家浜路）。两校一男一女，都属天主教教会办的私立学校。

姐姐秀外慧中,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不幸的是天不佑人,才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因患肺结核而辍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听到肺结核而且又已形成空洞简直就有谈虎色变似的可怕,几乎就成了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丝毫不亚于现在说的患了癌症。能有效治疗肺结核的唯一药物便是“盘尼西林”。所以这种只有依靠从国外进口的“洋药”便成了抢手的天价药。为了治好姐姐的病,母亲不惜一切代价,请了名医来家为其治疗,至于用了多少盘尼西林已无法算得清啦,同时还定期注射“空气针”(为压迫病灶肺叶,使之减少活动)。之前还请了一名中国护士专门护理姐姐,因她打瞌睡,母亲一怒之下换了个外籍女护士。就在这样不惜代价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左肺叶已经形成空洞的结核病灶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但从此姐姐也就再没有机会重新跨进学校大门了。姐姐因体质太弱在家被娇宠一生,从不动一针一线,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以致到了十六岁,还不知道“自来火”(火柴)是怎样划的。二十多年后,难得她在“文革”压力下,居然参加了里弄工厂劳动,挺过了自食其力的思想改造的坎坎,不啻又一人间奇迹。“文革”后,姐姐一家去香港定居。二十一世纪初,姐夫退休,两人才又双双返回内地来生活,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1946年中,姐在家中

我和姐姐自小就感情甚笃,玩耍时必定同进同出。我从杭州回来转入汇师小学后,成绩一直跟不上,考试时有不及格的情况,尤其是英语,杭州要初中才开课,汇师小学好像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设了。虽然寒暑假我都参加了补习,但还是有差距,每每成绩报告单交到母亲手里,姐姐就为我申辩并加以袒护;她又从不上街,从不买东西,有点零用钱和年节得到的压岁钱,大多被我一次次地“借”掉了……

如今姐夫、姐姐安居上海,每年我们都要去看望他们,平时也常有电话互致问候。蓉儿现在落户沪上,更是常常会去探望唯一的姑姑与姑夫。

现在我们姐弟俩已都是过了七秩快奔八十的人了。唯愿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安宁祥和。历经风雨见彩虹,坎坷走尽有坦途。毕竟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温暖并值得留恋的……

(二) 苦乐童年

1

我曾有一个幸福并快乐的童年,亦由于国难而有厄运降临。

从我记事起,父亲被延聘任职于总局设在杭州的苏浙皖税务总局会计主任任上,于是举家迁移到人间天堂的杭州城。凭借着西子湖和环湖起伏连绵的山峦这自然天成的秀丽景色,几千年来有多少文士墨客为她倾倒尽情泼墨,这里自无需多说。只用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来佐证就足够了。这里有山光水色,有晴姿雨态,也有碧波荡漾,更有雨帘中缥缈的山影……让人们尽着思绪的驰骋去想象吧,一幅奇幻的山水画轴! 变化多端的世界! 一到杭城父亲就将



读小学时的我

姐姐和我送入城中最好的惠兴小学读书,姐读五年级,我在一年级。父亲因为右腿装的是假肢行动不太方便,就买了一辆黄包车代步,车扶手两边有两盏锃光瓦亮的铜灯,踏步的地方还有个脚踩的铜铃,坐车的人只要轻轻一踩,铜铃便会发出清脆的“叮当,叮当”声。拉车的阿根三十来岁是从乡下出来的,一个憨厚老实的人。每天清早,阿根拉着车把我们姐弟俩送到学校,下午放学再来接我们回家。我特别喜欢坐阿根拉的车,因为他很听我的话。我说阿根快点,他就会拉着车一溜小跑;我说阿根慢点,他又会让洋车缓悠悠地晃荡;另外还因为坐在车上,可以不停地踩铜铃,听着那脆生生的“叮当”声响引来同学和路人们注视的目光,我心里就甭说有多高兴和得意了。

父亲在杭州城内最热闹的大街——延龄路上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顶了座大宅院作为住宅,那儿离西湖很近,穿出巷子只要走十来分钟就是湖滨的三码头。我猜想这座宅院的旧主人一定是个没落的官宦或富豪之家,否则它不会有这么宽

敞,这么气派。院中除了偌大一幢建在高高台基之上,有一个大厅堂和四间偏房,后边还另有四个小房间的翘檐长廊房外,走下五级台阶还有一个精巧的大花园,园子正中间是一个被一个半人高玲珑剔透的假山四面围着的池塘,池中许多红色的金鱼、黑色的鲤鱼和鲫鱼悠然地游来游去;穿过假山上的拱洞,可以踏上架在水面的五曲小石板桥走到池塘对面,从假山另一个拱洞出来;池塘西侧,还有一片小小的竹林,青翠碧绿,微风吹过,那细巧高挑的竹枝就像在丝竹弦管催动下,扭动着腰肢款款起舞的乐女,伴随着婆娑摇曳的枝叶会发出“沙沙”的响声,特别好听,尤其是到了春天,一场春雨过后,林中草地的落叶间便会冒出许多尖尖的披着棕色外衣的嫩笋,用不着打理,它一天就可以窜出三四寸高来,有时候娘姨阿金会钻进丛子挖几根竹笋去炒来吃;小竹林旁边,另有一排三间独立的小瓦庐,父亲说此处宁静,宜于读书做功课,让我和姐姐各住一间,中间一间就当作书房做功课用了。刚从喧嚣的上海来到这么宁馨安恬的落地,不由得让人想起“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的诗情画意来了。那竹林、那假山、那小桥、那游鱼都让我和姐姐欣喜不已,下课回到家情不自禁地丢下书包就会跑到池塘边去撩拨鱼儿,将碾碎的饼干屑慢慢撒到水中看着鱼儿蜂拥过来争食;就连家里新增添的成员阿根、阿金也都让人觉得有点奇特与亲切。

前面说了阿根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不出车的时候,他也闲不下来,总是拿着抹布闷声不响地擦车子,尤其是将那两盏晃晃悠悠的铜灯、铜铃和车轮上的钢圈与幅条反反复复地擦得光亮耀眼;再无事可做了,他又会慢慢地蹭到厨房去帮阿金洗菜、扫地什么的。阿金只要看到阿根来,也会毫不客气地指派他干这干那,好像厨房就有永远也干不完的事那样。最累的活儿大概就是劈柴了。那时候还没有煤球和煤气,杭州城里不论大家宅第还是普通人家,厨房里都盘着可以安放大小两口锅和另一个小汤罐的大灶,都是烧从山里拉来的木柴,有时候木柴是些锯成二三尺长的圆树棍,有时候还带点从地下挖出来的杂乱树兜,在烧之前,那些粗的、大的都要先劈开,再隔空码起晾干才能烧透。用长柄斧子砍柴可是个力气活,一般人家是雇请临工做的,工钱便宜,只需提供一餐便饭,再打发几个小钱便可以了。可我们家似乎从来就没有请过临工,每次都是阿金叫一声,阿根就乐颠颠地像领了圣旨似的,到厨房边脱掉上衣光膀子干开了。他每次都是先往手心上“呸”地吐一口唾沫星子,然后高高举起斧头,再用力地“嘿”一声大吼,斧头下来,地下的柴棍就成了两半爿;然后再是一口唾沫一声吼。等任务完成,又麻利地把它们齐齐整整堆码在可以避雨的厨房檐下,把场地清扫得干干净净,最后才抹一把满脸的汗水憨厚地冲阿金说一声:“好啦!”这时阿金准会端出一大碗早已凉好的开水(冬天是热水)递到他手上,再扯过一条凳子让阿根坐下